

[法] 戴密微 著

耿 昇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吐蕃僧诤记



吐蕃僧诤记

[法]戴密微 著
耿昇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西绕拉姆
特约编辑 王雍强

吐蕃僧诤记

[法] 戴密微 著

耿昇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625 字数：450千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3-01344-3/B·37

定价：29.00元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

季羨林

《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再加上另外一个优秀品质：善于发明创造。这两种品质合起来，就创造出来了长达五六千年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放异彩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学习他人之长，包括一切方面。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论，同样有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任务。当然，在这里，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发明创造仍然居第一位。学习他人之长与发明创造，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蒙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枬、朱杰勤、王左鲁、张小柳、何建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的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学习语言的才能，决不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就有必要看别人的翻译。我常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鄙薄翻译之意，我深以为异。如果没有翻译，古代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就能传到中国来吗？如果没有翻译，欧洲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

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多，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之广度与深度日益加强，我们不可能广泛阅读所有原著，我们更有必要参看别人的翻译。这一点，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来说，更是迫在眉睫。这种学问是最近七八十年以来新兴起来的。在过去，由于有广泛的国际协作，才能取得如此令人兴奋的成绩。今后这种协作只能加强，而万万不能削弱。特别是日本学者和法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必须继承老一辈学者那种勤于翻译的传统，更进而发扬光大之，否则要想开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新局面是决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出一套研究译丛。请一些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翻译介绍的同志们参加翻译。我们也希望，其他同行们在著作之余，也能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国外论著加以译译，以飨国内学人；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更多，研究水平一天比一天更高。

1984年8月1日

译者的话

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所著《吐蕃僧诤记》是一部名著。此书于1952年作为法国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文库第七卷在巴黎出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刊行，由法国国立印书局（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印刷。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其内容是关于“中印僧侣于8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的史料。书中发表了许多敦煌写本，尤其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第4646号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即《顿悟大乘正理决》。作者作了许多详细的考订，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可备一说。所以我们才决定将此书译成汉文。

作者把本书作为“第一卷”，他在前言里也说第二卷将是有关佛教教理和禅宗史的概观，但直到戴密微于1979年去世为止，尚未能见其问世。

作者在文中引用了许多汉籍资料，其中又多为僻书，敦煌文书中的标点与分段更难定夺；有关汉籍二十四史的引文有许多地方也与现今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断句、标点和分段有所不同，为了忠于原义，我们都是根据原法文版而断句、加标点和分段落的。对于书中所发表的敦煌写本，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办法。

本书是在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译出来的。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系王尧教授给予了我们亲切的关怀和谆谆指导，他多

次全文校对和修改译稿，为我们解决了许多业务和语言方面的困难。我国佛教学和西藏学的老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王森教授向我们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修改了原译稿中的一些纰漏。张毅、崔永乾、穆根来和单清江同志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谨在此一一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原名为《拉萨僧诤记》，我们根据戴密微先生本人于1970年所提出的改正意见而译作《吐蕃僧诤记》。原书中有大量脚注，为方便排版起见，所以又改为夹行注，同时又将原书末所附的《索引》改为《译名对照表》。对于书末所附的《顿悟大乘正理决》敦煌文书的影印图版，考虑再翻拍效果不好，所以删去不用。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指正为幸。

1980年8月15日

再版序言

在西藏人民出版社的亲切关怀和慷慨帮助下，在国内图书市场已绝迹多年的法国著名中国学家戴密微先生的世界名著《吐蕃僧诤记》，经历艰辛，终于再版了。由于此书是译作于八十年代初，刚涉足学术译坛时翻译的，20年的时光过去了，当时的许多未尽之言，今天也该一吐为快了。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是当代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他于1894年9月13日诞生于瑞士洛桑，1979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他1919年在伯尔尼中学毕业之后先后赴慕尼黑、伦敦、爱丁堡和巴黎求学深造。191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投在当时西方的中国学名流席微叶和沙畹门下，陆续学习了日文、梵文、藏文和印欧语系许多语种。戴密微1918年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后，于1919年成为当时设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公费学员。他1919年赴中国考察，1924～1926年间在厦门大学执教席，讲授梵文和西方哲学。他1926年赴日本，先任日佛会馆会长，1929～1930年间任佛教百科性刊物《法宝义林》主编。戴密微在远东生活十多年，1930年返法国，先在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任教，从1945年起在高等实验学院继马伯乐任历史语言系的研究导师，从次年起继伯希和主持法兰西学院的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直到1946年退休。戴氏中国学著作共160多篇（部），书评100多篇。

戴密微的藏学、敦煌学和佛教学名著就是他于1952年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八卷而出版的《拉萨僧诤记》一书。该书涉及到了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西域史、佛教史、禅宗入蕃史、吐蕃进出中亚史诸领域。他的学生和事业继承人后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和科学院院士的谢和耐先生于1979年在《通报》中撰文称该书“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也称该书是“当代欧洲佛教学和中国学的最高权威”。全书共分两章，第1章论述8世纪时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孛悉笼腊赞，有人认为此人是吐蕃赞普弃（隶）跢赞和唐金城公主的儿子）主持下，由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侣莲花戒在逻些（拉萨）就禅宗问题开展的一场大辩论。书中译注了P.4646号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它包括河西观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作的叙、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摩诃衍呈赞普的三道表章。戴密微在长篇注释中表现了他对梵藏文、佛教教理和经典方面的特长与渊博学问。第二章是史料疏议，译注了一大批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包括被吐蕃俘去的唐人诗文残卷）。他首次刊布了一大批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写本，提供了许多不见诸汉藏史籍的资料。此书中得出的沙州（敦煌）于贞元三年（787年）陷落入吐蕃的结论现已成为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此书实际上曾得到我国学者王重民多方面的帮助。

这次僧诤对于藏传佛教史，尤其是对于吐蕃的禅宗史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一事件不见诸汉文载籍，惟有晚期根据传说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藏文著作《拔协》（14世纪）、《王统世系明鉴》（1388）、布顿《善逝教法史》（1322）及《贤者喜宴》（1545~1565）中略有记载。敦煌藏文写本中也有记载（如

Pt. 823号)。但敦煌写本与晚期藏文著作中的记载完全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有关这次僧诤会的结果问题上。藏文著作认为是印度人获胜，吐蕃赞普反对汉僧摩诃衍一方。敦煌写本却认为汉僧于辩论中大获全胜，吐蕃赞普允许摩诃衍等在吐蕃传播禅宗并取得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一批吐蕃人皈依禅宗，只是由于吐蕃王宫某些大相“谋结朋党”，汉僧才受迫害。藏文著作是晚期的传说，敦煌写本则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或是同时写成的，为该档案作序的世俗文人王锡就是见证人，奉大师之命作序，所以它更为翔实可靠一些。

戴密微 1960 年在冢本善隆祝寿文集《佛教史论丛》中发表《有关中国禅宗的两卷敦煌汉文写本》一文。2672 号敦煌写本也是有关这次僧诤会的，基本与 P. 4646 相同，但多 20 页，个别措辞和句子也略有差异。戴氏对这两卷写本对照比较后，互相参照作了校勘，使之成为一部非常宝贵的小部佛典。

戴氏著作发表 30 多年来，对这次僧诤会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意大利藏学家图齐 1958 年在《小部佛典》第二卷中根据晚期藏文史料，尤其是根据《贤者喜宴》而反对“拉萨僧诤会”一说。他认为这场大辩论是在桑耶寺举行的，提出了“桑耶寺僧诤会”之说。1964 年，日本禅宗研究专家上山大峻又发现了一卷叫作《大乘二十二问本》的敦煌汉文写本，其内容也是针对这次僧诤会的。他于是便得出结论认为共举行过两次讨论会，第一次摩诃衍获胜，第二次莲花戒获胜。戴密微 1970 年在《通报》中发表近 10 万字的书评《敦煌学近作》，对日、英、法、美、意、匈、新加坡以及我国港台 22 篇（部）敦煌学著作作了评价。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拉萨僧诤”而接受“吐蕃僧诤”一说。他认为从未举行过一次或两次

面对面的僧诤会，只不过是持续了数年的一场笔墨官司，因而建议将其书易名为《吐蕃僧诤记》。日裔法国学者今枝由郎 1975 年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找到了有关这次僧诤会的文书，也支持“吐蕃僧诤”一说。日本一批后起之秀也参加了这场辩论。戴密微 1979 年在《敦煌学论文集》第一卷（于他死后出版）中发表了《从敦煌写本看汉地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对这批日文著作作了分析。他又根据《历代法宝记》和《楞伽师资记》等敦煌汉文写本以及《拔协》等晚期藏文著作而提出由无住（714～774），及其师无相（684～762）为代表的四川“成都宗”在禅宗传入吐蕃中所起的作用。新罗僧无相就是《拔协》中的金和尚，曾于 750～760 年间会见墀松德赞的使者。英国学者吕埃格（D. Seyfort Rugg）于 1986 年在汉堡召开的第三十二届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了《有关吐蕃僧诤的三种藏文文献》一文（该论文集于 19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日本禅宗专家上山大峻于 1988 年 10 月 4 日～8 日在日本龙谷大学举行的法日两学者参加的《出自西域的文献和档案》科学讨论会上又发表了《吐蕃僧诤的新视野》（该论文集于 1990 年在京都出版）。所有这些论文都对这次僧诤作了全新研究。1992 年 10 月，吕埃格教授告诉译者，他即将出版有关这次僧诤的新专著，主要是从藏文文献中寻求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译者至今尚未读到此书。

这场有关吐蕃僧诤的大辩论促成了法国研究有关吐蕃古代史的敦煌文书的一次高潮，而且波及到了欧洲、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

正如译者于本序言一开始就曾指出的那样，此书是译者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刚从外事口转到中国社科院时翻译的。戴密

微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学大师，《吐蕃僧诤记》又是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多学科领域中的名著。书中广征博引，引证了大量的稀见敦煌文书和其他西域出土文书、颇难核对的汉文典籍和藏文、梵文以及当代东西方学者的有关著述。就其文字而言，书中大量使用了当代西方语言、日文、藏文、梵文、突厥文、蒙古文和其他西域死文字。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鉴赏力，作者又利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天主教的术语来论述藏传佛教，用西方的行政词汇来论述中国的典章制度。这样一来，若将该书从法文译作英文或当代其他西文，则相对容易，而译成汉文就太难了。我记得英国学者吕埃格曾对译者讲过，英美有不少学者想把此书译成英文出版，终未成功。当译者与法国学者讲到已将该书译成汉文时，他们都惊讶地表示“难以置信”。由此可见本书翻译的困难程度。

20年前，当译者着手翻译此书时，对于其中的专业知识，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幸亏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王森教授、当时正在北京工作的四川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毅先生帮了许多忙。王尧教授从头至尾地审读了译稿。但王森与张毅先生早已驾鹤西游。值此本书再版之际，特向学术界的这些先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难度极大。作者原书中也有不少错误，这在一部开拓性的著作中也是难免的。该书的法文版于1986年在巴黎再版，当时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侯思孟（Donald Holzman）已作了部分更正。但由于译者太忙，无法再将汉译本重新校对一遍了，甚为遗憾。

本书出版15年来，早已绝版。1999年5月，西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旺久先生来京出差，得以拜访。译者提出再版此书

的设想，得到了旺久社长的慷慨应允，从而才有了本书再次与读者见面的机缘。在商品经济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西藏人民出版社竟有如此之胆识，实在令人钦佩。特此向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与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识

1999年7月10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前 言

本书（至少是第一卷）的资料主要是取自于敦煌汉文写本，其中大部分是由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王重民先生推荐给我的。他甚至还很盛情地送给我他的一组数量很大的影印件或手抄件，这是他于1934—1939年间协助巴黎国立图书馆为伯希和敦煌汉文文书编目期间在巴黎和伦敦亲自编制的。王重民先生已经出版或介绍了保存在伯希和档案中以及保存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许多敦煌汉文文书，他发现了这些写本之间的同一性和相互关系【这些文献没有一卷是关于吐蕃的。参阅1936—194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的王重民所著的两册《巴黎敦煌残卷叙录》；1935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第2卷，第2期，第71—84页；1935年9月出版的第2卷，第3期，第159—168页以及1939年3月的新编第1卷，第1期，第4—14页；1935年7—8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4期，第1—5页；1935年11—12月出版的第9卷，第6期，第5—32页；1936年1—2月出版的第10卷，第1期，第1—46页，1936年11—12月出版的第10卷，第6期，第1—16页；1935年11月出版的《金陵学报》第5卷，第2期；1950年上海出版的《敦煌曲子词集》等书】。

王重民打算一旦在情况允许时就在中国发表一部主要是有关汉藏关系的重要资料集。本书翻译和研究的都是这些文献之中未曾刊布过的资料。当然，我也参阅了全部引文中所提到的资料的原件。

在预计王重民先生的作品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尽力避免全文转抄或发表敦煌写本原件，而只限于在注释里引用一些主要段落（并按照西方的方式加了标点）。但最主要的一件原写本在本卷书末尾影印发表，而且我也全文译出；对其它写本原件则仅限于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和摘要。全文解释则必需冗长和枯燥的注释，因为大部分文书都是残卷，常常又是错误百出和含糊不清，或充满着毫无意义的文学含蓄。我认为应该只注意其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对那些只进行了翻译而未加概括的各段落都用引号或小字体标明。因此，本书只有志于粗略分析一下有关汉、藏关系的资料，这也是我最初认识王重民先生的结果。在多次友好的会见中，他以其渊博的书目学知识慷慨地帮助我撰写本书。我不禁惋惜地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几年。那时，每逢星期三，他总会给我带来他一周来的最新发现，我们一起度过一整天以共同钻研，一起查阅《大正新修大藏经》和西方西藏学家们的著作。

我在本书中也没有系统地使用唐代有关吐蕃的汉文经典资料，因为这些资料不但面很广，而且其编目工作也搞得很糟糕，几乎从未有人对这些史料（尤其是对史料的来源）进行过考证性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文献是《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关吐蕃的几卷。伯希和于1920年和1921年在法兰西学院两度讲授过有关西藏古代史的课，并将新、旧唐书中的这几卷译成了法文，可惜它仅仅是初稿，未加注释，而且也过时了。这一译文不久将由L. 韩百诗先生在《伯希和遗著》中发表，但我没有使用它。S.W. 巴沙尔于1880年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2卷，第435—537页上发表的英文旧译本也过时了，而且在阅读时还必须参照原文，我只参阅而没有使用它，只简

单地称为“巴沙尔译文”而列在书中。《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我是根据1888年上海出版的《图书集成》版本引用的，书名只缩写成《旧》字；《唐书》（成书于1060年，同一版本）的书名只缩写成《唐》字；《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根据1900年《图书集成》的版本引用）的书名只缩写成《资》字；《资治通鉴考异》（1085年成书，根据《四部丛刊》版本引用）只用缩写词《考异》来代替；《册府元龟》（1013年成书，根据1754年版本引用）的书名只缩写成《册》字【为了阅读和查对的方便，本译文仍标明了所引书的全称。——译者】。这后一部书虽然很有价值，但查阅起来却很不方便，我只使用了其中有关“外臣部”的最后几卷（即966—1000卷）。我应该感谢已故的林藜光对其中年代学的考证，他生前为了自己使用而整理了有关吐蕃几卷的某些段落；承蒙R.戴何都先生美意借给我日本东京1938年出版的《册府元龟》第152—164卷，第966—1000卷的索引，我同样也有所参照；《通典》（801年成书）是根据《九通》的木刻版本（浙江书局1882年版）引用的；《唐会要》（961年成书）是根据江苏书局1884年版本所引用；《唐大诏令集》（1070年写成）是根据《涉园丛书》的版本引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包括的佛教著作是日本最新版本的佛教经典，我只用字母“T”来表示，随后附有该书中佛经的编号，偶尔也用罗马数字来表示各卷的编号。

我几乎从未亲自使用过藏文史料的原件，因为我并不精通这一语言。本书是一部汉学家的著作，所以大家就应该原谅它强调了唐朝对吐蕃佛教起源所起的作用。我的西藏学同事们，诸如M.拉露小姐、J.巴科和R.A.石泰安先生都赏脸不辞辛苦地阅读了清样。大家可以在《补遗和校勘》中发现他们的指

正意见，而这些观点正是我的书中所没有使用的。卢万大学的 E. 拉摩特先生表示自愿从藏文翻译有关拉萨宗教辩论会议的一卷印度史料，并允许我发表他的译文，我对此深表感谢。

这第 1 卷写成已有十几年了。从那时以来，M. 拉露小姐、J. 巴科和 F.W. 托玛斯先生以及 G. 杜齐和其他人的研究和发现在许多方面都向前推进了我们对古代西藏的认识，我只好勉强将本书公开发表。如果说本书的内容是成功的话，但写作形式则大为逊色，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那种彻底改写已写成的第一稿的耐心。这就是我没有能够避免文章和注释比例不协调的原因之一，这些注释逐渐充斥了各页的下半部，甚至是整页……我谨请读者们原谅这种讨人嫌的不平衡状态，这也是由于专业上的某种变化所引起的。因为大家知道，汉文中的注释一般不是置于主体文章之外的，也不是写在每页的下面或卷末，而是随着文章用小体字标出的。这就可以使读者们无须费力地反复来回查看原文和注释了。如果在印书中想不到使用这种办法的话，那怎能称得起一位汉学家呢？

本书所使用的唐代汉语发音原则上是根据 M.B. 高本汉的《解析辞典》的规则对音的。我从来没有核对过 1940 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一书中较新的对音法，笔者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幸接触到这本书。我注意到罗常培先生所著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该书的基础是汉、藏文史料。

本卷书包括关于拉萨宗教会议汉文档案文书的译注，紧接着是史料疏义和作为附录的两卷印度档案片断的译文。《史料疏义》一部分可能稍微显得长了一些，更何况这一章是按照零乱的敦煌文书曲折地展开论述的，我试图用索引的办法来弥补这一散乱状态。拉萨宗教会议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我认为应该